

自序

王稼祥研究论集

徐则浩著

我从事王稼祥著作和生平的研究，转眼已
有十^年了。1982年4月，由安徽社会科学院（
1983年4月改归安徽大学社会科学系）
但，承担王稼祥著作和生平的研究课题。我也
参与其中，与吴光主编编辑《回忆王稼祥》
（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王稼祥选集》
（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两本书。作为
《王稼祥选集》的重要文献^{之一}，它^的珍贵精神财富的《
王稼祥选集》的编辑工作，是在中央文献研究
所的指导下完成的。

十年来，在从事王稼祥著作和生平的研究
工作中，我个人也陆续撰写了一些专题研究

安徽人民出版社

王稼祥研究論集

伍修權 辛未秋



122096

自序

我从事王稼祥著作和生平的研究，转眼已有10个年头了。

1982年2月，由安徽省社会科学研究所（1983年4月改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组织课题组，承担王稼祥著作和生平的研究项目。我也参与其事，并先后主持编辑了《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两书。作为党的重要文献和宝贵的精神财富的《王稼祥选集》的编辑工作，是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指导下完成的。

10年来，在从事王稼祥著作和生平的研究工作中，我个人也陆续撰写了一些专题性研究文章。现在把这些文章集中起来，编成《王稼祥研究论集》公开出版，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以便把对王稼祥的研究提高一步。

要说在对王稼祥的研究工作中有什么体会的话，那么，最主要的体会就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应当把历史人物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

在198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6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决定列举的建党以来38名卓越的领导人物，其中就有王稼祥，而且把王稼祥列入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这是对他一生的崇高评价，他也是当之无愧的。王稼祥成长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他献身革命之初，满怀革命热忱，在莫斯科中

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勤奋学习的精神，当然值得人们敬佩，但是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脱离实际，对马列主义理论的教条主义习气比较严重，以致1930年回国后在艰难复杂的革命斗争中，这个毛病暴露出来了。他把共产国际指示、苏联经验神圣化，犯了“左”的教条主义错误。对此王稼祥一生中经常自我反思，引以为训。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当然并不回避这一段历史，也不应该回避这一段历史。1931年4月，他到中央苏区后，在实践中才逐步端正思想路线，摆脱“左”的教条主义影响，向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奋进的。我们应当历史地研究历史人物。

王稼祥一生的功绩甚多，对遵义会议、六届六中全会和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作出的贡献尤为卓著。我们研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功绩，要把个人的作用和党的集体联系起来，不能离开党的集体而夸大个人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的，以民主集中制作为自己的组织原则的。任何一种正确的主张、意见，只有为大多数同志所接受，在党的集体里占优势，才能形成决策，付诸实践。说一个人可以扭转乾坤，可以挽狂澜于既倒，这不符合客观实际，不是历史唯物论，而是历史唯心论。作为一位卓越的领导人物，必须善于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否则就不可能获得聪明才智、远见卓识。因为任何一种正确的主张、意见，都是来源于实践，来源于对客观实际情况的明了。王稼祥之所以能够对遵义会议作出重大贡献，因为他面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被迫长征后面临的绝境，回顾他亲自参加的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两相比较，深刻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军事路线的正确和“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思想、军事路线的错误，竭力主张要挽救危局就非

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不可。他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也是因为他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又吸取了当时不少领导同志和战友们的意见而加以概括的。他在1962年向党中央提出关于对外工作方针性的建议，也是对当时世界局势作了调查研究，集中了许多同志的意见，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形成的。

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45年党的七大这10年间王稼祥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长征途中的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参与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许多重大决策。众所周知，在党的历史上实现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后，开始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应当说，在这10年间，王稼祥是这个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格局，则是在党的七大才确定下来的。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南方，刘少奇先在华北、后在华中，朱德又经常赴前方，王稼祥1938年8月回国后则常驻延安，当时用毛（泽东）、王（稼祥）或毛、朱（德）、王联名发给各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的文电，数以百计。这是王稼祥作为党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确凿的历史见证，因而他的这种历史地位是客观事实。恩格斯说：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我们研究党史，研究党史人物，只有掌握大量的文献档案，才能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研究，这是基本的前提。

回顾10年来，自己力求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研究工作，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足之处甚多。虽然注意到了收集文献档案的工作，也收集了不少，但还不够全、不够多，不少方面还有待深入挖掘；对于各种背景资料的收集和研究，也有待于扩展；研究水平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这些不

足，应当在今后撰写王稼祥传记时加以弥补。行百里者 半 九十，今后仍要花大力气，下苦功夫，把这件事做好。

前面说过，收入这本书的是我近10年来撰写的一些研究性文章，其中有些已在报刊上发表过，有些则还没有发表过。这里要说明以下几点：第一，收入本书的文章，还没有包括王稼祥一生的全部活动。譬如建国后在对外工作方面的贡献也是很重要的，我还没有来得及撰写莫方面的专题文章，有待于今后深入研究；第二，因为这些文章是在不同年份陆续撰写的，其中有若干交叉重复的地方，好在所占的份量很少，不再处理；第三，凡是已经公开发表过的文章，在文末注明所发表报刊的期号和出版日期。这些文章不再改动，个别地方只作纯属文字性、技术性的处理。

本书承蒙中顾委常委伍修权同志题写书名，对作者是莫大的激励，今后要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对王稼祥的研究提高一步。

（ 1991年 9月14日 ）

目 录

自序.....	1
王稼祥传略.....	1
圣雅各中学——王稼祥献身革命的起点.....	29
关键性的抉择——王稼祥在上海大学附中.....	42
王稼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49
王稼祥在1930年的艰难历程.....	65
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的前前后后.....	75
长征途中的王稼祥.....	83
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	92
在上海地下党的精心掩护下 ——王稼祥1937年3月至6月在上海.....	102
王稼祥对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	107
王稼祥和《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118
王稼祥与延安整风运动.....	128
王稼祥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及其贡献.....	137
王稼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功绩和理论贡献.....	151
王稼祥和东北解放区的城市工作.....	159

《回忆王稼祥》编后记·····	172
《王稼祥选集》编辑记事·····	174
党的重要文献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王稼祥选集》简介·····	180
读王稼祥《为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坚强而斗争》·····	185
艰苦朴素 谦虚谨慎	
——老一代革命家王稼祥的优良品质·····	190
不能认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是邓拓最早提出的·····	193
1925年芜湖教会学校学潮概述·····	196
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	207
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共党史上一次重要关键的会议·····	212
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军工作·····	220

王 稼 祥 传 略

王稼祥(1906—1974)，原名嘉祥，别名稼穡。1906年8月15日出生于安徽省泾县厚岸村。父亲曾在南陵县弋江镇入股经营当铺和油坊。少年王稼祥在家乡柳溪小学毕业后，又先后在南陵县乐育学校和芜湖圣雅各中学高中部上学，以勤奋好学，成绩优秀，受到老师、同学的好评。柳溪小学虽然处在偏僻的山村，但已开设英语课，这在当时皖南农村小学中是为数不多的。而乐育学校、圣雅各中学又是两所教会学校，尤其注重英语教学。所以，中学时代的王稼祥就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

1924年王稼祥进入芜湖圣雅各中学后，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芜湖是长江沿岸水陆交通要道，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斗洗礼，各种新思潮比较活跃。设在长街的科学图书社是发行进步书刊的一个阵地，书店虽小，却吸引了不少革命青年。王稼祥常常利用有限的课余时间，到科学图书社，用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零用钱，购买进步书刊。据他自己回忆：“1924年我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书刊”，到了1925年，“阅读了图书馆中所有的有关社会科学的书籍以及当时可以在书店买到的《新青年》、《向导》和《中国青年》，思想就更左了”。王稼祥在教会学校读书，又切身感受到外国帝国主义进行奴化教育的种种祸害。不论教徒和非教徒，校方都规定神学、圣经为必修课，礼拜天一律进教堂做礼拜，饭前、饭后都要祈祷，对

学生有严格的管教，政治思想上的控制尤其厉害。校方又用毕业后推荐职业或保送入圣约翰大学为诱饵，笼络学生。王稼祥并不俯首贴耳地听凭校方的摆布，而是另有自己的打算。在¹1924年9月9日他给本校学友王柳华的信中说：“我想我们到学校来，也无非想得点知识，求点真理，若说为饭碗，而离开这亲爱的家乡，那恐怕不值得吧？”他对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尤其厌恶，不满情绪逐渐发展为反抗精神。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正是在他步入青年时期孕育起来的。

1925年5月，芜湖教会学校学生掀起要求收回教育权、反对奴化教育的爱国学潮。王稼祥是圣雅各中学高中部的学生代表。他在校内外奔走呼号，联络组织，揭露校方的阴谋，向社会各界申述学生的正义行动。5月26日，他同另一位学生代表被派往当时安徽省会所在地安庆，同省教育厅交涉芜湖各教会学校退学学生的转学事，并同安庆教会学校学生组织了安徽反对教会学校联合会。5月30日，王稼祥从安庆致函圣雅各中学高中部全体同学，告知“祥等与教厅再三磋商，转学一事已获许可。”他在函中还说：“回首已往，颇觉愉快，脱黑牢而入天堂，弃黑暗而受光明，前途绵绵，希望已临，诸君闻之，定拍掌而欢，抚心而笑，翘首东望，诸君勉之。祥当努力直往，决不中馁，想诸君定能信任也。”6月3日，王稼祥返回芜湖，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然而他却被校方除名了。但他义无反顾，坚信自己所走的路是一个革命青年应该走的路。

1925年8月，王稼祥进入上海大学附中高中三年级学习。正如他自己回忆的那样，在学潮后，“我则因向往当时最革命的学校之一——上海大学，而转入该大学的附中。”当时正值五卅运动之后不久，上大学生同帝国主义英勇搏斗、不怕流血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气概，使王稼祥受到极大的教

育和激励。他作为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代表，参加了附中部学生会的领导机构。9月8日，他在给王柳华的信中表达了振奋的情怀和志向。信中说：“上大为革命之大本营，对于革命事业，颇为努力，余既入斯校，自当随诸先觉之后，而为革命奋斗也。”王稼祥在上大附中只经历了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却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成长过程中的重大飞跃。他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起点。同时被选派赴苏联留学。10月，上大附中主任侯绍裘找王稼祥谈话，告诉他在莫斯科办了一所中山大学，到那里去学习就是学习革命，问他是否愿意去，并告诉他那里的生活比较艰苦。王稼祥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去。行前，王稼祥再次写信给王柳华，陈述了毅然赴苏留学的目的：“我们应该以国民革命的手段，联合国内的革命分子和世界上的被压迫者，去打倒帝国主义，去铲除军阀，那我们的自由，才可能恢复，我们的生活才可安宁。”“我们既要革命，必须先研究革命理论，实习革命方法。于是我毅然决意到莫斯科进中山纪念大学，去预备革命。”

1925年10月28日，王稼祥同一大批赴苏留学生乘苏联货船离开上海，经海参崴改乘火车到达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由于他有较好的英语基础，即同张闻天、沈泽民、吴亮平等11人被编入英文班，直接听外语讲课。据伍修权回忆，王稼祥在中山大学学习十分勤奋，特别爱静、爱读书。“当时我们的宿舍条件并不很好，就在走廊里放了许多小桌子，给大家用来自习。稼祥同志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后，至少还要加班两个小时。他自习的位置就在我住的寝室外面，我几乎每晚都看到他伏在那张小桌上，认真阅读英文或俄文的理论书籍。他这种刻苦自学并且持之以恒的精神，对我的思想曾经有很大的触动和

影响。”王稼祥很快熟练地掌握了英、俄两门外语。他从莫斯科给王柳华的信中说：“我幸亏有英语语言知识，因此很快地学习了一种新语言（俄文）。现在我说和写都很流畅。”1928年2月，王稼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和张闻天、沈泽民等人经过严格的考试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同时又在中山大学教一门课《中国问题》。在几年学习期间，他刻苦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政治经济学、哲学、东西洋革命史、中国问题等基础课程，对苏联又作了实地参观和考察。因此，他较为系统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去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

1930年2月，王稼祥回国的要求经组织批准了。他结束了在莫斯科四年多的留学生活，3月到达上海，被分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和《实话报》、《红旗报》主编，开始投入到国内的革命斗争中来。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党内开始形成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由于王稼祥当时还缺乏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因而卷入了这种“左”倾错误之中。

王稼祥在苏联学到了苏维埃的理论，而在当时国内的苏区也已经有了苏维埃的实践，因此他很向往苏区的斗争实际。六届四中全会后，他提出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工作的要求，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在这同时，中共中央收到了苏区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报告，特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给予全权解决富田事变问题。中共中央还做出决定，委任王稼祥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把25岁的王稼祥推上

了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岗位。

二

王稼祥同任弼时等于1931年3月到达中央苏区。这时，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已经结束，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即将开始。刚从白区来到苏区的王稼祥，一切都感到新鲜，尤其注意从苏区军民的斗争实际中汲取营养。王稼祥到闽西，恰遇正在指挥部队进行军事演习的闽粤赣军区参谋长肖劲光，他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即提出要跟他去参观部队演习。他不仅认真地观看，而且向肖劲光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求教。

在龙岗地区，王稼祥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这次会见给王稼祥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他后来回忆说：我们向他报告了四中全会的经过，而他则向我们详细地叙述了红军中争论的历史以及当前的争论问题，并拿了一些文件给我们看。他又说，同毛泽东初次见了几次面以后，就给了我这样的印象：他是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不相同，他是独特的，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的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新鲜和有说服力。

在中央苏区工作时，王稼祥执行中共中央的某些决定和指示，犯过“左”的错误。在处理富田事变时造成了肃反扩大化，在土地革命中执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错误政策。1931年11月，在中共中央代表团主持下召开的中共苏区党组织的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等，王稼祥也是有责任有过错的。由于他重视调查研究，注意了解实际情况，因而在工作中减少了或者避免了“左”的错误造成的损失，提出过不少正确的意见和主张。1931年4月至8月，因邓发尚未到职，王稼祥

兼代过政治保卫局局长，当他发现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后果时，又较早地提出了制止乱捕人、乱杀人的主张。他不赞成在干部问题上的惩办主义政策。有些在前方被撤了职的师、团级干部，调回总政治部听候组织处理，经王稼祥耐心问明情况和教育帮助后，能不给组织处分的尽量不给组织处分，有的只是调动了工作，有的则暂时留在总政治部当巡视员。这在当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左”的政策盛行的情况下，也是很不容易的。后来，当“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人错误地斗争和公审肖劲光，并作出了处分决定时，王稼祥不同意对肖劲光的处理，几次拒绝在处分决定上签字。他的这种坚持党的原则，不顾个人安危，冒险保护同志的精神，赢得了许多同志的敬佩和感激。尤其可贵的是，他对毛泽东在反“围剿”战争中提出的战略战术和作战原则，一开始就表示钦佩，认为毛泽东“诱敌深入”的主张是正确的，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不赞成项英的主张。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曾说过：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

在1931年11月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又被选任外交人民委员。并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1931年12月14日，驻扎在江西宁都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举行起义获得成功。王稼祥是这次起义的精心指导者之一。在酝酿、准备起义的过程中，他同刘伯坚、左权受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派，带着电台来到宁都县固厚区（彭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联络、指挥。王稼祥仔细听取了二十六路军地下党支部代表的汇报，分析了二十六路军官兵开赴进攻红

军前线后普遍存在着的不满情绪，该路军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以及该路军内部官兵之间、派系之间的矛盾，认为二十六路军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形势，指出了起义的有利条件和应该注意的问题。起义原定12月13日举行，因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又由于从南昌运出的2万多套棉衣刚到广昌，13日才能运到宁都，经王稼祥同刘伯坚、左权等中革军委代表研究后，决定起义时间推迟一天。14日晚起义胜利后，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15日晨出宁都东门开赴苏区，受到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宁都起义的胜利，给国民党反革命势力一个沉重的打击。鉴于红五军团指战员都是北方人，才到江西，言语不通，不仅不能做群众工作，连采买都感到困难，为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和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于12月21日发布关于调送一批本地战士给红五军团的命令，要求“由各军及各独立师每个伙食单位内，调出一个战斗员，到五军团去帮助他们工作，并要在里面起革命作用”。1932年3月11日，中革军委又决定把五军团分编。王稼祥《关于在一、三、五军团分编问题给各级政治委员的指示信》中，详尽地解说了分编的意义，指出一、三、五军团分编对五军团有莫大的帮助，可以帮助五军团建立红军制度，学习群众工作，解决行军、宿营、作战中的困难。同时，对一、三军团也有很大帮助。因为五军团有较长的历史，阵地战经验很多，可以帮助一、三军团肃清游击主义和农民散在性，学习阵地战、白刃战、攻城战和一切军事知识。王稼祥漫信中还强调指出：只有一、三、五军团彼此帮助，才能使一、三、五军团更快的锻炼成工农红军铁军！只有一、三、五军团分编后，更使士兵有阶级的团结，阶级的亲爱，彼此帮助，彼此学习，决不应存任何地方观念、小团体观念，并且要同这些不正确观念斗争，才可以使一、三、五军团分编得着伟大的胜

利！这对于胜利实现一、三、五军团的分编任务有指导意义。并对加强红军建设，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也有指导意义。

1932年2月初，红军攻打赣州。在这之前，苏区中央局在瑞金曾讨论过打不打赣州的问题。毛泽东是反对打赣州等中心城市的，主张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王稼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后来，根据1932年1月9日《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要占取重要的中心城市以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的指示，加之中共中央又给苏区中央局发来“急攻赣州”的命令，于是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多数都主攻打赣州，认为打下赣州，就可以控制整个赣南，可以把湘赣苏区联成一片，占据江西省的大半。王稼祥也接受了中央的决议和命令，同意打赣州。既然决定打，王稼祥作为总政治部主任，对参战部队作了政治动员，力求打好。这次战斗，从2月4日开始围城，历时一月有余，终因城高墙厚，敌人工事完备，防御力量较强，红军又缺乏攻坚战、阵地战的经验，久攻不克，损失很大，到3月7日被迫撤围。

王稼祥在《围攻赣州的教训》一文中，认为对国民党军阀重视城市的程度估量不足，对围攻重要城市的困难估量不足，同时也没有先赤化城市之四周，建立广大苏区来包围城市。他指出：“此次攻赣的战争表示出，红军中游击主义的传统仍很浓厚，如下级不执行上级的命令，警戒疏忽，各自为政的现象，不能配合统一指挥之下作战，而更严重的是后方工作不健全，粮食、弹药、新兵、医院以及运输问题都没有实际进行，而是临时敷衍，后方的工作不健全，使前方增加许多困难。”在后来的宁都会议上，王稼祥的态度，更反映他在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主张是正确的。由于对第四次“围剿”的军

事方针产生分歧，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会议。宁都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左”的指导思想支配下，讨论和总结从2月以来苏区中央局确定的军事方针及其在战役战斗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所谓“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错误地批评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从而发生了毛泽东是留在前线指挥还是留在后方的问题。王稼祥主张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指挥作战。王稼祥的意见尽管处于少数，但他的这种态度，正如胡耀邦所指出：“可以说，那时他就同王明路线划清界限了。”宁都会议后，王稼祥协助周恩来、朱德抵制了苏区中央局确定的“左”的军事方针，从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并结合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制定了正确的作战原则，在苏区军民充分动员和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王稼祥为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建设作出了贡献。他指出：“思想上的一致，才能保证行动的一致，才能保证战争中统一意志的实现，思想上的任何动摇甚至最微小的动摇，都是有害于战争胜利的。”在政治工作中，他反对不深入和官僚主义作风。他认为，思想领域里的残酷斗争和惩办主义倾向，“只会产生恶果，这是政治工作的耻辱和罪恶。”他提倡并坚持把思想教育作为红军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在他的主持下，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教育委员会，专门研究红军中的教育问题，纠正过去红军中的教育缺乏组织和统一计划的弊病，确定了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在教育委员会下面，还组织了编译委员会、政治读本委员会、教育计划委员会，以切合红军战士的需要，编写出版了《红军识字课本》、《红军读本》等教材。鉴于红军部队是以工农为主体，很多干部、战士没有文化的实际状况，王稼祥大力提倡学文化，强调干部、战士要掌握文化知识，认